

李光甫

俄罗斯行吟

227
332



俄罗斯行吟

李士非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.625印张 1插页 30,000字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平装印数1—1,500册

ISBN 7-5360-0786-8 / I · 704

平装定价: 1.60元

I227
3332



作者摄于哈登村

791821

序

林贤治

遥想伏尔加，一冬的积雪尚未消融，这里则是寒风料峭。正值公历已告初春而阴历仍在岁暮之际，我畅饮诗人李士非的新作：《俄罗斯行吟》。

这是他作为中国文艺报刊代表团的成员之一，在访问苏联期间写成的一部诗集。这些诗，凝聚着作者在半个月时间内激发的热情和紧张的思考。它们不具任何官方色彩，不是哪一种外交文件的形象演绎；但也不是旅行家日志，它无意猎取异域的水光山色，民俗风情。作者是一位来自为浑浊的、湍急而屈折的黄河所浇灌的国度的思想者。他有他独特的眼光。而今，进入他的视界的是另一番风景：俄罗斯人的作为受难者和苦斗者的强壮的灵魂。正是在灵魂的注视中，他发现了自己的民族：我们脚下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？我们来自哪里？又将通往何方？……

在世界上，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像苏联一样与我们命运攸关的国家了。所以，从郭沫若的《匪徒颂》、蒋光慈的《新梦》开始，我们的诗人才在大半个世纪中献给它那么多的礼赞，而后复投以同样多的诅咒。无论是颂歌、战歌或挽歌，都是群体的单一的旋律；对于苏联，不回避历史的血腥和现实的阴暗，能够把社会真实同个人沉思结合起来，在中国新诗史上，当始于《俄罗斯行吟》。

如果说，从前的颂歌带有颂神的性质，那么它则是明显地渎神的；从前的颂歌是一种理想主义，甚或盲目乐观主义，那么它则属于清醒的现实主义。踏进异国，最强烈地吸引了诗人的目光的，就不是红星，红墙，红色领袖的雕像，而是断头台，弹痕，警钟，黑色的祭坛。即使是阿芙乐尔的光荣的舰旗，他所关注的也不是历史的投影，而是它在改革的劲风中展示的未来的方向。

面对耸立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外面的赫赫有名却又鲜为人知的断头台，诗人感慨万端：革命胜利后，为推翻沙皇而竭诚尽力的布哈林们仍惨死于不叫断头台的断头台！可怕的不是沙皇，而是“沙皇的幽灵”，因为后者是活着的历史。又如《早安，列宁格勒》写基洛夫之死：“只因他有太高的威望/命中注定他要挨那一枪”。诗中把这段故实同“文化大革

命的炼狱”联系起来，抒写了诗人，同时是数万万中国公民的“四十多年的向往与忧伤”。在《哈登村》这首已被译成白俄罗斯文的长诗中，诗人指出：由于“几乎怀疑一切的领袖”轻信了一个狂人，终至于带来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劫难，带来绞架、坟墓、火与废墟，带来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。哈登村，是作为战争中的186个人口灭绝的村庄的代表在诗中出现的。在村子遍立的纪念碑顶，悬置的铜钟每隔半分钟便鸣响一次，你难道可以充耳不闻吗？难道以“向前看”一类辉煌的借口，便可以轻松地扔下沉重的历史而拒绝回顾？诗人说：

可是法西斯
不只穿一种制服
说一种话
当它变化了形态
必须认识它

一个长着两只羊角小辫的红卫兵，六十年代的造反者和忏悔者，在诗中是一个象征性符号，它表明：“法西斯细菌”不只在党卫军中滋长，几十年后，仍然吞噬着人类的灵魂，驱使他们敌视，仇杀，互相摧残。在这里，诗人突破原来一直固守的意识阈

限，表达了他的忧思。

正是在对于神祇和英雄的衰渎中，诗人把颂赞的目光转向普通的苏联公民。他这样写冬宫讲解员：“可以忘记／冬宫的女皇／永远忘不了／你的形象”；这样写芭蕾舞演员：“她的王国／名叫天鹅湖／联合国没有席位／席位在亿万人心上”。人民是王，人民是上帝，人民是真正不可战胜的。只有怀着对于人民的力量的确信，诗人才能唱出：“光有教堂／没有断头台／沙皇不放心／既有教堂／又有断头台／沙皇还是灭亡”！

不同于其他诗人，作者对苏联人民的赞颂，并不在和平建设中所创造的巨大数字上面，而在于他们对反人性，反人道的强权意志的抵抗，和对于民主政治和精神自由的内在渴求。钢铁为谁冶炼？煤炭为谁开采？人造卫星为谁发射？人民，是社会改革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所在。如果离开了人民的需要，无视人类作为众多自由个体的联合存在的目标，一切改革，都将走向异化，而以损害和毁灭人类文明为其代价。基于这种认识，诗人高度评价萨哈罗夫的莫斯科户口，《莫斯科新闻》的公开性；深情赞美莫斯科大学的尊严和艺术家大厦的光荣，赞美无论是政治局委员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在这里都一律平等的步行街；无情地嘲笑可以抛开工作不管，

仅仅为了陪伴国际名流——一个外国老头的党政官员，嘲笑官僚主义，和其他有待改革的弊病。诗人以热情的诗句，呼唤社会对于人民在改革中的主体作用的确认：让政治、经济，知识和艺术，整个的社会向人民敞开吧！

人民——改革，就这样构成了诗集的基本主题。

由于在人类共同的命运中找寻到了一个契合点，诗人便获得了一种阔大的情怀，穿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多年的隔阂，唱出内心深处的那份深厚的情感。“感谢大自然／造一座巍峨的大山／左手挽着中国／右手挽着苏联”。在《俄罗斯行吟》中，诗人多处记录了苏联人民的珍贵友谊，这是使人读后永远无法忘怀的。鲁迅说：“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，相关心。然而最平正的道路，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，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。”从诗集得以发现，作者就是走这条道路的很少的人们中间的一个。而这，也便同时成了我乐于把它介绍给读者的因由。

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。可悲的是，从社会到诗，长期以来我们竟忽略了这句西方古老箴言的命脉所在：人。对于苏联，作者所以能够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，在他的诗中纳入深刻的颂歌内容，都源于某种历史的契机。正如《失眠》一诗所说的：“我们两国／

有太多的相似之点——／冬宫——故宫／红场——天安门广场／列宁墓——纪念堂／1937年——1957年／直到改革的必要／和艰难”。所有这些，是只有在度过许许多多劫难之后的今天，才可能获得较为充分的认识，和较为坦率的表白机会的。

当然，《俄罗斯行吟》能够成为中国诗坛对此作出的真实的回声，无疑地不能忽视诗人的主体作用。在参观诗人库巴拉故居时，作者赞扬他吮吸“人民的痛苦”成长，其实可以视作一种诗观的表达：真正的诗歌，应当生长在人民的痛苦和时代的意向之中。这一观念，对于作者个人来说，并非来自哪一位理论保姆的外部灌输；它所以富于血肉生命，乃来自对民族的厄运和自身的挫折的痛苦反省。

近些年来，“自我表现”说在理论界甚为流行。我想，此说自然是不错的。一个作品，如果不能表达作者自己的内部世界，那么它将无异于路面的沙子或者汽车部件之类，又何劳乎创作？强调“自我表现”，对打破客观主义、公式主义，打破各种“瞒和骗”的文学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但是，有人却据此引申为这样一种理论：所谓自我表现，即意味着诗歌应当离开政治，离开社会，甚至距离愈远愈好。其实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并不妨碍“自我”的存在。姑且撇开如康德所说的“非社会的社会性”这个根本

无法割舍的事实不说，单就个人具体的人格结构而言，也都无法作统一的规限的。无疑地，这是又一种反独断的独断论。即如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夏尔丹，在论及人的现象时，也都严格地批评了这种把自己和他人，个体与群体对立起来的错误，说：如果要实现真正的自我，就要与他人一起向奥米加之点汇集；而在这一点上，绝不是自我的个体化而是自我的人格化。一个诗人，倘是时代和人民在他那里同自己的命运密切相连，为什么非要制造“人格分裂”，把前者从完整的“自我”中剔除出去不可呢？“水至清则无鱼”。当把所有与外界相关的元素剔除干净以后，试问，“自我”将剩下些什么？！

诗可以群，可以思。社会性和思考性都一样无损于诗。我喜欢《俄罗斯行吟》也就在这里，即使有的稍嫌粗直了点，毕竟是扭扭捏捏的才子诗所无法比拟的。

难得是热爱人类的心灵。

1990年元月，于广州锦堡。

目 录

序.....	林贤治
飞出国境.....	1
莫斯科黎明.....	5
知识节.....	7
断头台.....	9
波罗金诺之战.....	14
机密.....	16
女王.....	18
步行街.....	22
天山.....	24
少先队员的誓言.....	26
阿拉木图有个四岁的男孩.....	30
相逢.....	32
早安，列宁格勒.....	33
冬宫讲解员.....	35
冬宫，夏宫.....	36

致阿芙乐尔.....	38
好天.....	43
摇篮.....	44
赠奥丽娅.....	47
失眠.....	48
哈登村.....	53

飞 出 国 境

不知不觉中
飞出了国境
窗外已是别人的蓝天
脚下已是别人的森林

越来越远了
我的北京
我的广州
我的八十五岁的母亲
我的五十八岁的妻子
我的青春焕发的孩子们

越来越远了
我的肝胆相照的朋友
我的矛盾重重的同仁

我的困难
我的烦恼
我的又苦又涩的争论

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
在心里却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……

1988.9.1.下午3时
于波音707飞机上



1

1

莫斯科黎明

生物钟把我叫醒

4 点正

祖国上班了

这里正是黎明

莫斯科郊外的晚上

早已从歌声里熟悉

莫斯科的黎明却很陌生

这里的黎明静悄悄

莫斯科河波澜不兴

几乎所有的窗户都闭着眼睛

而北京已经车如流水

而广州早已是不夜之城